

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谢勇 次仁旺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作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十五五”时期各项工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全会不仅着眼于“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规划,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系统谋划,还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神,需要以更宏阔的历史视野把握其时代方位,以更系统战略思维理解其顶层设计,以更强烈的使命担当践行其部署要求,从而准确把握其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战略价值,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磅礴力量。

历史维度:承续百年伟业,擘画复兴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为“阶梯式递进”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哲学基础。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延伸,而是由一个个关键节点构成的阶梯式递进过程。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继续奋斗。这一定位,精准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坐标,既承接了“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又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方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直至此次四中全会聚焦“十五五”时期发展,这一系列重大部署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我们党始终以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引领民族复兴伟业稳步前行。这种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高度历史自觉和战略定力。这种历史演进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既保证了政策稳定性,又体现了制度优化率,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环境,全会强调必须“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这正是基于对历史方位清醒判断后的主动作为,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运用的集中体现。

理论维度:创新时代思想,领航理论实践

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指导,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最新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全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突出体现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规律,既体现了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自觉遵循,又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和原创性贡献。特别值得深入理解的是,全会对“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化、体系化理论建构。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确立“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战略导向,具体化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多维度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设计。这种全面、系统、协调的发展观,突破了传统发展理论的思维局限,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范式,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选择和实践路径。全会还创造性地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任务,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系统论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矛

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娴熟运用。这些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时代课题,展现了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理论自觉,使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实践维度:远瞻战略部署,夯实发展根基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宏伟的蓝图,也需要付诸坚实的行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强烈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它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应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风险挑战的战略部署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全会直面“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压力,以及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等现实挑战,提出了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等,每一项任务都精准对标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人民的急难愁盼,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辩证统一,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化、精细化,彰显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国际维度:贡献中国智慧,胸怀天下大势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

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不仅着眼于国内发展,更以宏阔的全球视野,规划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篇章,这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集中展现,也是负责任大国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主动担当。放眼国际关系历史延续,这种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战略思维,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全会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这充分表明,尽管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的逆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且正在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化。立足于人类文明赓续,全会部署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创新”“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举措,旨在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体现了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责任担当。与此同时,全会从人类文明互鉴视角出发,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观点,强调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面对全球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的现代化新路,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深刻的理论创新、坚实的实践路径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征程上矗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深刻领悟其精神实质,要求我们不仅看到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更要理解其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战略价值;不仅要把握国内发展的具体部署,更要认清其对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视野来看,全会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联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生动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将全会绘制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作者均为自治区党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正确方向推进。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坚持“富民兴藏”,将文化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通过非遗工坊带动就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权益、文化产业促进增收,让群众获实惠。这启示我们,文化保护需与群众生产生活结合,让群众成为参与者、受益者,才能激发文化生命力。未来,要聚焦群众需求,推动文化设施从“有”向“优”、文化活动从“多”向“精”转变,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运用现代科技推动文物数字化、非遗信息化、语言文字标准化,让传统文化适配现代文明;创新传播方式,利用新媒体讲好西藏文化故事,让其扎根高原、走向全国、享誉世界。未来,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探索“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等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传播渠道,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提升西藏文化影响力,实现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西藏文化保护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西藏文化保护将继续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指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至上、守正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让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重要力量,为中华文化繁荣贡献雪域智慧。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示范工作室(培育类)中央民族大学“共育·共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室负责人)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

正本清源,强化历史教育。可以将清代涉藏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系统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群众性主题教育中,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出版普及读物、制作纪录片等形式,讲清楚西藏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讲明白中央政府对西藏一贯的主权管辖,用扎实的史料筑牢历史认知的根基。

古为今用,活化地名文化。建议开展针对清代西藏地名的专项研究与应用工作。恢复与规范地名地名:将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名,如“宁静山”“丹达山”“南墩村”“琉璃桥路”等,予以恢复或作为标准名称使用,使其成为街路牌、地图上的“活教材”;完善标识系统,对御赐寺名等,可采用历史名称与现行名称并列标注的方式,彰显历史渊源。在历史墙站、古道遗址设立说明牌,重现当年的民族交往场景。

深化研究,推动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鼓励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加强对清代涉藏地方志的整理、翻译与数字化工作。通过实地调查、验证、补充和活化文献记载,挖掘更多承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与口述史料,并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和社会宣传教育资源。

本文受2022年度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清代西藏方志舆图的国家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2BZS01)支持完成。

(作者系西藏社科院南亚所副所长、主任编辑)

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

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中,“‘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是其中之一。我们要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既要有践信守诺、坚定推进的勇气和担当,又要有慎重稳进、善作善成的智慧和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今年是“双碳”目标提出5周年。5年来,中国始终以扎实的行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和智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全力构建清洁能源“一基地、两示范”发展格局,重点统筹区内保供和区外清洁能源外送,初步构建起以清洁能源为主、多能并举的能源体系,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玉察等多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稳步推进,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启动,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全区上下逐“绿”前行、向“新”而兴,“双碳”战略稳妥有序推进,为碳达峰碳中和作出了积极贡献。

兑现“双碳”承诺,我们的决心和态度无比坚定坚决,但必须立足国情结合实际自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双碳”目标的实现绝非易事,特别是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政治化趋势增强,部分西方国家打“气候牌”,出台碳关税等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等,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坚守“双碳”目标,又要灵活调整策略,确保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担当,同时保障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通盘谋划、稳中求进,综合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等,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政府和市场、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多维度关系,确立基于中国国情、西藏区情的“双碳”目标实现路径与方式,把握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节奏与力度,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

(谢会时)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西藏文化保护的实践与意义

供邱泽仁 岳永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立足西藏工作实际,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将“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重要内容,为西藏文化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西藏文化保护突破传统模式,构建起全方位、系统性保护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厚文化力量。

新时代西藏文化保护的全方位实践与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历史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文字等领域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多层次保护体系,让雪域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一)历史文化遗产:守护文明根脉,实证多元一体

西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新时代,西藏建立起“国家—自治区—市(地)—县”四级文物保护体系,将文物保护与历史研究、文化传播深度融合。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等世界文化遗产,开展常态化修缮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档案,实现永久保存与线上共享,让更多人领略世界文化遗产魅力。

阿里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文

鸟兽纹锦、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考古发现,揭示了西藏与区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轨迹,让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激活活态传承,赋能民生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涵盖藏戏、《格萨(斯)尔》、藏医药浴法等门类。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构建“传承人培养—传习基地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活态传承体系,让非遗从“博物馆展品”转变为“生活文化”。

在传承人培养上,西藏认定各级非遗项目与传承人,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鼓励开展传习活动;建立非遗传习基地与工坊,为藏戏、唐卡绘制、藏香制作等非遗提供传承场所。

藏医药保护传承既遵循传统医理,又融入现代医学理念。通过专业人才培养、医疗机构网络完善,提升基层藏医药服务覆盖率;整理出版《四部医典》等古籍,推动藏药生产标准化,让古老医学既守护健康,又成为地方特色产业,实现文化与实用价值的统一。

(三)语言文字保护:保障使用权利,促进文化交融

西藏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教育、行政、公共服务领域保障其学习使用权利。

在教育领域,中小学普遍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藏语文课程,既帮助各族学生融入现代社会,又学习传承民族语言文化。行政与公共服务领域,西藏自治区人大决议、政府文件均同步使用汉藏文字;公共场所设施、招牌标注双语文本;卫生、邮政等行业提供藏语言服务,便利群众日常使用。

同时,推动藏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发展。全国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发布多批涵盖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术语;2015年,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藏文词汇》发布,为藏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西藏信息化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推进汉藏对照语音查询平台建设,助力各民族语言文化交流交融。

新时代西藏文化保护的经验启示与未来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文化保护积累宝贵经验,为民族地区提供有益借鉴。站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节点,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对推动文化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统筹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传承与中华文化认同,避免文化保护陷入“封闭保守”或“过度商业化”误区。未来,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党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文化保护规划、实施、资金使用全过程,确保文化保护工作沿着

发挥清代涉藏地方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韩连启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记录西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与社会文化的珍贵文献宝库。这些志书不仅系统性地承载了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历史记忆,更生动详实地刻画出各民族在西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图景。深入挖掘与阐释清代涉藏地方志的深厚内涵,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记录中央治藏与国家统一的历史丰碑

清代涉藏地方志的编纂与形成,本身就是国家主权行使与行政管理体系完善的直接体现。清朝通过派驻藏大臣、划定行政区域、建立驿站塘汛、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对西藏地方进行了有效管辖。这一历史进程,被系统、客观地记录在各类方志之中。

首先,方志的编纂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文化认同。从最早的《藏纪概》到集大成的《卫藏通志》《西藏图考》,编纂者或为入藏官员,或为奉旨修志的学者,其编修行为是国家行使文化主权、了解与治理边疆的自觉行动。如《大清一统志·西藏》的修撰,将西藏纳入全国性的总志体系,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西藏的法律与行政地位,

是“大一统”政治理论和国家格局的文献实证。

其次,方志内容是国家治理实践的详细档案。方志中对驻藏大臣衙署(如“宗喀斯岗”“札什城”)的记载,对川藏驿道沿线塘、汛、台、站的设置与管理(如“阿足鲁塘”“楠多塘”),以及对疆域界址的明确划定(如“宁静山”立界),无不以白纸黑字证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治。这些记录铁证如山,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威历史依据。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承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地名、风物、习俗与事件的记载,使清代涉藏地方志成为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百科全书”,其价值远超地理标识的范畴,升华为深厚的文化符号。

地名见证交融历史。方志中的地名体系多元一体,是民族交融的直观反映。御赐地名,如康熙、雍正、乾隆为甘丹寺、纳塘寺等赐名“永泰寺”“普恩寺”,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与管理,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调适的结晶;汉藏合璧地名,如“鹿马岭”(藏名“蒲葛仓”)、“热水塘”(藏名“擦擦卡”),以及大量“某某塘”类驿站名,既是语言融合的产物,也标志着人员往来、物资流通、

信息传递的关键节点;汉语地名及建筑,如“琉璃桥”“双忠祠”“关帝庙”,不仅承载了文成公主进藏等历史记忆,也记录了清代官兵驻防、修建设施的历史,是外文化在西藏落地生根的见证。

史实叙写团结篇章。方志中记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核心主题是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无论是记录清军平定准噶尔之乱后修建的“丹达庙”,还是记载乾隆时期驱逐廓尔喀入侵后新建的“关帝庙”,其背后都是朝廷军队、西藏地方僧俗民众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集体记忆。这些事件通过方志的流传,转化为凝聚共同体情感的英雄叙事。

风物描绘共生图景。方志中对贸易集市(如“南墩”庙会)、道路交通、生产技术的描述,展现了西藏与内地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互补与物质交流。而附载于程站条目下的诗词歌赋(如王我师、杨揆等人的诗作),则是进藏官员与文人的情感抒发,他们将西藏的山水人文纳入中华文学的审美与表达体系,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与认同。

挖掘与利用清代涉藏地方志,赋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